·文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05

《四库全书总目》诗教规约下的词学

王 芹,何宗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诗学和词学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诗教与词学的关系则一直是这一问题中的重要内容。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独辟"词曲类",标志着词学正式进入官学理论批评的行列,诗教也成为其中的重要批评维度。就《总目》中诗教与词学的整体关系看,主要是诗教对词学的全面规约,具体表现为以诗教论词体、以诗教正词史、以诗教评词作。在这个过程中,馆臣对词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形成了在清代官方诗教引导下,比较系统成熟的既融入诗教理念又注意到词体艺术特征的词体观念和词学理论。作为词学批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总目》词学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对清词和清代词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诗教;词学;规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6-0046-12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者,也被视为一部绝无仅有、特色鲜明的文学批评巨著,其集部"词曲类"提要中就蕴含着丰富的词学批评内容。近年来学界对其的关注逐渐增多,主要从全面观照的视角探讨其中的词学、词籍批评成就,总结其词学理论和思想[①]。其中仍有极大的探索空间。作为"国家意志的文学批评"[②],《总目》以其官方立场与我国儒家诗教传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乾隆为代表的高层以"清真雅正"为裁定历代典籍、品评诸家作品的基本原则和纲领,词体在官方上被纳入"诗教"的运作轨道。四库馆臣在词类典籍的总纂与书目提要的撰写中亦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诗教理念审视词体,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总目》诗教规约下的词学状貌。就《总目》中诗教和词学的整体关系看,主要是诗教对词学的全面规约,包括以诗教论词体,以诗教正词史,以诗教评词作,形成了既融入诗教理念又注意到词体特征的词体观念。同时,在清代推尊词体的主旋律与民间词学的影响下,馆臣也注意到词艺的特殊性。作为词学批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总目》词学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对清词和清代词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以诗教论词体

词源问题,被称为千年学案[③]。词体本身音乐与文学兼具的属性,使词源的追溯更具复杂性。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提要考辨与学术批评还原研究"(项目编号:17AZW012)。

[作者简介]王芹,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85471301@qq.com;何宗美,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李剑亮:《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孙纪文:《〈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籍批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②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李昌集:《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体发展上，词常以诗体附庸的身份出现，故称“诗余”。传统文体观念中，词最初“花间樽前”“聊佐清欢”的属性与儒家“言志载道”的功能定位相左，被视为“小道”。随着词体的产生与发展，用诗学改造词体的现象不断，诗教对词学的影响也日益深化。《四库全书》及《总目》乃最高统治者大力支持并亲自参与的官方文化工程，其官学性与词这一非正统文学形成冲突，对词的认识、取舍和评价上自然不乏政治力量的干预。在词体认识与阐释中，《总目》的批评理念和方法中多融入诗教因素，本质是对词体的否定，目的是将词体区别于诗体的地方加以排斥，进而以诗教的标准加以规约。

在文体定性与定位上，《总目》依诗教标准对词的音乐属性进行定性并重新归类，体现了诗教对词体娱乐属性的批评。作为纲领的“词曲类”总序，集中代表了《总目》的词学观，“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①]。提要基于由正而变的文学史观和文体尊卑观念，因词体最初合乐而歌的音乐属性具有“俳优”的杂体性质，而视其为文类“附庸”，足见鄙薄之深。“乐”与“艺术”，在今天并无身份的优劣等次之分，而在古代乐属经部，艺术则为子部中的杂记之属，二者在功能与地位上大有悬殊。《总目》认为“乐之纲目具于《礼》”，承担着“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的巨大政教功用。而自汉代俗乐渐起，“兼陈雅俗，艳歌侧调”[②]，“非复《清庙》《生民》之奏”[③]，并认为“论管弦工尺者不过世俗之音，亦改隶艺术”[④]，音乐的性质和功用已发生了改变。“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⑤]因此在《乐类序》中将词由“乐类”退列“艺术”系列，对词体音乐属性的判定上升到了“文统”认识的高度。这一标准在四库纂修中被严格执行，如《新唐书·艺文志》中《教坊记》《乐府杂录》《羯鼓录》被归于“乐类”[⑥]，提要则认为这种归类“雅正不分”，只有划归艺术，“庶各得其伦”[⑦]，体现了在归属性质认定上的差异，是《总目》提要以诗教批评词体音乐属性的典型例证。

《总目》对词体音乐属性的重新归类最终目的是对词体文学属性的考量。我国早期文学观念即有诗乐合一的特点，诗论从乐论派生而出，礼乐是治国之本。词最初为“音律之事”，提要认识到音乐在词体成体、衍变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这种音乐系统的特殊性。音乐通过人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可以感染人心。词乃诉诸听觉的歌韵文学，它的“许多曲调迥然有异于传统庙堂乐章那种典重乃至沉闷的基调，而充溢着世俗性的欢快冶荡心音”[⑧]。而“歌词本是配合曲调的文字，曲调作为音乐形态本身即具有声情特色。曲调的声情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决定了歌词的内容风格”[⑨]。词源本身乃一个音乐史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词最初应歌娱乐的音乐属性决定了词体“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⑩]的文学属性，音乐特性决定了词体风格，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划定了词为艳科的品性。“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⑪]，《总目》对词体产生过程中音乐和歌词之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词曲类”，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9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8“乐类”，第500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2“艺术类”，第1479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32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8“乐类”，第500页。

⑥《新唐书》卷57，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3-944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3“案”，第1509页。

⑧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⑨孙克强：《宋代诗学与词学》，《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宋名家词》提要，第2818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乐章集》提要，第2780页。

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在“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①]后,仍多有关注,从音乐和文学的双重角度对词体内容和艺术形式表示不满。这主要表现为以儒家诗教原则批评词体的艳科娱乐功能,体现了词体认知上的官方性和正统性,是诗教和乐教的统一。

除了从功能定位上对词进行价值判断的规约外,《总目》还从文体渊源、诗学理论上为词体辩护,以确立词体正统的出身地位。在传统文体观念中,词品位较低,不能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提并论,《总目》即以“文体衰变论”和“文体尊卑论”集中代表了这一文体演变流程与谱系观念。是以当清廷出于特殊目的,假文体之计,布“世道之防”目标时,就须先推尊词体。

首先,《总目》探本求源,将词体溯源至《礼记》和《诗经》,明确了词体出身的正统。“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体理论,它除了具有为词体溯源的功能外,往往承担着“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②],甚至名为“尊经”而实为“尊体”的一种策略,这一点《总目》概莫能外。“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③]《总目》分别从音乐和文学两个维度为词体找到了出身依据,前者上溯至乐之纲目《礼记》,文学性则承传自儒家经典《诗经》。从音乐溯源看,《总目》肯定我国早期文学诗、乐合一的特点,并认为词的音乐体系“本雅音,旧列乐部”,而汉代以来“俗工拔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④],词的音乐功能发生了转变,遂成为技艺。虽则出于政教功用的考虑,《总目》否定了词的音乐系统于后世衍生的休闲娱乐功能,但这一溯源无疑从根本上确立了词体音乐出身的正统性。文学属性上,将词体的源头由律诗上溯至古诗,“词又降于律诗”“律诗降于古诗”[⑤],再由古诗上溯至《诗经》,“然三百篇变而古诗”[⑥]。《总目》对诗、词同源的追溯,就从根源上肯定了词体文学属性的正统出身。

其次,《总目》还将词体的特性与传统诗学范畴的“变风变雅”相联系,并从官方上确立了“兼收两派,不主一隅”的词体正变观念。正变论本是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个传统命题,最早产生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后被引入词学领域。正变的区别主要在表现手法上,但后来的“正变”概念中,常含有褒贬抑扬之意。两宋时期,词体风格是否当行本色的讨论已隐含有正变的内涵[⑦]。明代张綖最早提出婉约、豪放两种风格划分,明确了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词体正变观念[⑧]。清代不仅沿袭了婉丽为宗的风格观念,在词体正变的态度上亦发生了变化。“至于桑中蔓草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盖蕙茝可以比贤者,嘤鸣可以喻友生,苟读其词而引伸之、触类之,范其轶志,砥厥贞心。”[⑨]桑中蔓草,即《离骚》之“香草美人”传统,《离骚》向来是变风变雅的代表,表明了在词体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向诗教传统的靠拢。此段文字虽出自康熙《历代诗余序》,却不妨作《总目》观念之始。而《总目》谓施绍莘词“大抵皆红愁绿惨之词,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⑩],说的就是变风变雅“怨而迫,哀而伤”的特质所在。在词体的发展流变上,《总目》沿袭了词体正变的风格形态区别,并能“柳、周婉丽之音,苏、辛奇恣之格,兼收两派,不主一隅”[⑪]。在态度上,也突破了以价值判断来区分优劣的标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宋名家词》提要,第2818页。

②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8“乐类”,第500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2“艺术类”,第1479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花间集》提要,第2803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词曲类”,第2779页。

⑦孙克强:《清代词学正变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⑧张綖:《增正诗余图谱·凡例》后附识,明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刻本。

⑨沈辰垣等编:《历代诗余·御制历代诗余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4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花影集》提要,第2816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第2806页。

准，标志着词体正变理论走向的深入。同时亦能推陈出新，肯定姜夔“词家正宗”[①]的身份地位，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格律词派“第三派”的地位，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总目》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基础之上，以官方立场审视、批评和阐释词体，其批评理念多从政教功能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以诗教为原则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总目》并非简单地否定词体，而是以诗教的标准全面引导规范词体，在这一过程中，《总目》对词体特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二、以诗教正词史

《总目》虽非严格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但其对历代词人词集的批评，总结起来便是一部中国词史。在朝代更迭的时间序列中，《总目》尤以明代为观照点，强调词运与世运的正相关性，体现其词史建构中的“世运说”；在横向脉络梳理上，尤其两宋词坛，又以较通达的态度看待词学流派的生新流变，但对艳、俗词的批判一以贯之，呈现了一部经过择选后的“雅正”词史。而根源上，《总目》正是依据传统诗教观念进行词史建构，“雅正”乃付诸文学层面的要求。作为官学，《总目》“反对时俗、流行大众文化”[②]，对“雅正”的界定更具政治色彩。如朱彝尊亦以“雅正为鹄”[③]，但“斥淫哇，删浮俗”[④]的主张更指向文学本位中的雅俗之争，在批评视角和目的上都与《总目》相异。而从词自身看，其“民间”[⑤]的出身，“胎带的俗艳色彩”[⑥]，“好之者终不绝”的脉流承传，皆与清廷建立雅正文化的诉求相违。因此从政治角度对词进行价值判断，依诗教“雅正”标准择选和定位词人词作、删削和厘正艳俗词史，可谓《总目》的必然选择。

在词人的历史定位与词史建构上，《总目》以诗教标准批评、淡化艳俗词作者的成就和历史贡献，全面删削厘正艳俗词史。中国词史中，温庭筠和柳永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重要人物。前者是文人词的开山祖师，以“香而软”[⑦]的词风集中代表了“花间”一派的整体风格特征，为词的“艳科”格局和“婉约”风格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馆臣虽以《花间集》为最早的词总集，却以冯延巳《阳春词》为最早的词别集[⑧]，词集著录上更是推晏殊《珠玉词》为首，再结合温氏数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实际状况，如“绮靡软熟”[⑨]“多绮罗脂粉之词”[⑩]“柔媚旖旎，全类小词”[⑪]，可知这是馆臣主观选择后的结果。田同之说：“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遂启词端”[⑫]，明确温氏在词体衍变中所作的重要贡献，而馆臣仍多有指摘，并一再回避其成就的原因是出于诗教理念。“商隐感伤时事，尚颇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词综》提要，第2806页。

②吴承学：《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

③陈匪石：《声执》卷下《词综》，《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62页。

④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王镇远，邬国平编选：《清代文论选》（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8页。

⑤夏承焘：《唐宋词论丛·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6页。

⑥孙克强：《宋代诗学与词学》，《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⑦孙光宪：《北梦琐言》，王奕清：《历史词话》卷2引，《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0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第2806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乐府遗音》提要，第2816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1《李义山诗集》提要，第2020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8《铁崖古乐府》提要，第2259页。

⑫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第2册），第1452页。

得风人之旨”[①]“寄托深微,多寓忠愤”[②],李诗因符合诗教传统故被肯定。而温词“意在闺袜,语无寄托”[③],当文艺变成娱乐乃至享受的工具,这自不是馆臣所能认同的。

后者柳永是俚俗词派的开山祖,也是中国词史上以俗招恶名之最者,《总目》中馆臣也是极力消解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词派在词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柳词贴合受众娱乐需要,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④]。提要转述叶梦得对柳词之评,而仅予“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的评价,与项安世“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⑤]的高度褒扬落差巨大。至谓词“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⑥],也仅肯定其语言的浅近直白。而“颇以俗为病”[⑦],则直接否定了柳词的“俗”之特质。显然馆臣多是基于自宋以来既有的柳词地位,而不得不持有的共识立场。《乐章集》的排序上,馆臣也颇费心思。单以年齿论,柳永比排在首、次席的晏殊、欧阳修皆长,而词集却在之后,虽然《总目》的文集排序并非全以生卒先后为准,但结合作家地位及其文学思想和文风倾向加以定夺[⑧]之举是实在有之的。另外宋代曾形成一个以民间词人为主的颇为庞大的学柳词派,可惜的是,该流派一直饱受打击而未能被文学史记下[⑨]。尽管馆臣有因资料匮乏而沿袭旧史的可能,但从《凡例》可知,《总目》在此类书籍的去取上异常严格。如石孝友词向来被学界赞赏,馆臣也本拟“录存”,却被乾隆以“敦崇风教,厘正典籍”的宗旨“命从摒斥”[⑩]。对俗文学的轻视是《总目》的一贯立场,究其因还是与传统儒家诗教理念的不合。

再次,在词史梳理上,竭力删削艳俗词史,形成有明三百年“无词”的荒凉景象。《四库全书》共著录词别集五十九种,其中宋五十六种,金、元、清各一种,明代不录。其对明词的鄙弃,非“不能入宋人阃奥”的标准所能尽释。而“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的官方标准,就从根源上注定了明词的命运。明人以“主情近俗”为核心词学观念,其中的“情”尤主艳情,同时受“曲化”观念影响,表达上又以“俗”为主要体貌特征。明词“曲调柔靡”,受社会风气影响,在“情”的表达上往往突破儒家诗教标准,为了适应下层读者要求,题材选择、语言表达上通俗浅显,呈现“倡俗反雅”的倾向。以《草堂诗余》为例,其在词体选择上“近俗”,风格上独尚“婉丽柔靡”,“对明代词风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⑪],代表了明人的词学审美倾向和艺术标准。《总目》谓《草堂诗余》“参杂俗格”[⑫],从态度上就集中反映了与明人在词学观念和审美风尚上的冲突。

第四,《总目》以诗教厘正词史,还体现为尤其重视词的思想内蕴,将“雅正”的旨归凌驾文艺标准之上,其审视的严苛,连浙西派首领朱彝尊亦莫能免。自南宋刘过以《沁园春》咏美人指甲和足,便以细腻精致的技艺,代表着艳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⑬]。张炎称“工丽”[⑭],陶宗仪赞“纤丽可爱”[⑮],朱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1《李义山诗集》提要,第2020-2021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1《李义山诗注》提要,第2021页。

③赵崇祚辑,李冰若评注:《花间集评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页。

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2编10),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⑤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全宋笔记》(第6编10),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东坡词》提要,第2782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乐章集》提要,第2780页。

⑧何宗美:《〈四库全书〉体系中的欧阳修“褒贬”问题揭析》,《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⑨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178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凡例》,第33页。

⑪张宏生:《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⑫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花庵词选》提要,第2804页。

⑬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⑭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咏物》,《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

⑮陶宗仪撰,王雪玲校点:《南村辍耕录》卷15《沁园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彝尊更仿作十三首。对该类词的评价历来不一，主要基于视角的不同，肯定者多出于对艺术性的倾倒，反对者多从思想意旨上予以批驳。馆臣即是后者，而其虽未对《总目》著录《曝书亭集》中的《沁园春》十三首有所指摘，但叱责其中的《风怀》二百韵诗和《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皆“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并以“风雅之正”的名义要将其“刊除”[①]。今检《风怀二百韵诗》确已被删[②]，而《静志居琴趣》仍在，这种错误主要当由馆臣和誊录官工作衔接上出现的纰漏所致[③]。而“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亦各有义例”[④]不过是一种说辞，根本还在性质的界定。《风怀二百韵诗》和《静志居琴趣》乃朱彝尊为妻妹所作，倾注真情，却是不容于家庭伦理的恋情。对艳词的定义通常包含两性恋情和性欲，后者乃“淫冶讴歌之曲”[⑤]，自是被批判的对象，但对前者的认识却长期处于困惑状态。约言之，艳词的价值应以主体对爱情的态度为主要标准，而不能以传统词为艳科的体性和题材内容的特点来进行简单的价值意义的判断[⑥]。朱彝尊的爱情诗词恰恰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表明着他曾为追求幸福而尝试所展现的个人本质力量。陈廷焯即认为其“空前绝后”[⑦]，代表着我国艳情词史的真正高度。而馆臣却以极消极的态度视此，甚至剥夺了经学造诣为乾隆赞赏[⑧]的朱氏入“儒林传”的资格。翁方刚为四库纂修官，尝校正《经义考》[⑨]，他对《总目》的立场有更详之解：

> 惟以其《诗集》内有《风怀二百韵》一首耳。昔竹垞自定其集，已删去此首，既而不能舍之，绕几回旋至通夕不寐，乃曰：实不欲弃此首，不过不吃生猪肉耳。盖自知其集有此作，不能配食庙廷也。然而毕竟有《经义考》三百卷，即使不可配食圣庙，而入《儒林传》究与配享不同。[⑩]

从上文可得信息有三：其一，风怀诗是朱彝尊思索再三后所留，他深知将付出的代价。其二，馆臣对艳情诗词一贯鄙视，并据以裁定文人文坛地位。其三，朱彝尊因风怀诗不得入“儒林传”，这一定位始自《总目》且影响深远[⑪]。而馆臣立场的根源在其官学性：

> 江声之《尚书注疏》不用旧注疏一字也……此人若入《儒林传》，将必开嗜异者自撰注疏之渐，即使其中无诞妄不经语，而此风亦不可长……不可不防也。[⑫]

上文虽非专对朱氏而言，但不妨得知“经崇世教”“严汰而宁拘门户”[⑬]是《总目》一以贯之的铁律。正因恋情诗词传递的精神趋向严重违背诗教，原被赞“事事皆工”[⑭]的朱氏，因德行有亏被贬“文苑”，这显然也是皇帝首肯并深为其时馆员们所赞成的。《总目》思想审视的严苛程度，远驭文学标准之上。

---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3《曝书亭集》提要，第2345页。

②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古今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7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5页。

③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239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3《曝书亭集》提要，第2345页。

⑤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乐府上”《柳三变词》，《全宋笔记》（第5编4），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⑥谢桃坊：《宋词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补《竹垞艳词空前绝后》，《词话丛编补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26页。

⑧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1777）圣谕：朕阅四库全书馆所进抄本朱彝尊《经义考》，于历代说经诸书广搜博考，存佚可征，实有裨于经学，朕因亲制诗篇，题识卷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儒林传”下一《翁方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95页。

⑩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1《与曹中堂论儒林传书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1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29页。

⑪按：今检阮元《儒林传稿》无朱彝尊，而阮氏此稿多袭《总目》。《清史列传》《清史稿》朱彝尊都在“文苑传”中。

⑫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1《与曹中堂论儒林传书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1册），第430-431页。

⑬永瑢等：《进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页。

⑭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20页。

第五,出于词体功能的考量,《总目》对寿词在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大大缩减了其在词史中的分量。祝寿词是生日风俗的娱乐性和词创作之娱情性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应用性较强的文体,内容的单调与思想的贫乏往往使其文学价值不高。四库馆臣批评寿词,除"颟顸通用,一无可取"[①]的文学价值考量外,更在于其成为文人竞逐名利的工具。如张榘应酬词中,"寿贾似道者五,寿似道之母者二,其余亦大抵谀颂上官之作"[②]。毛滂为蔡京祝寿,因"一词甚伟丽,骤得进用"[③]。可见馆臣对寿词的否定多是基于传统诗教理念对词体内容及功能的厘正。而寿词的意义还在于能反映社会风貌文化,提要从洪咨夔寿词想见"世业之盛"[④],即是一证。

《总目》的词史是历经择选和厘正后的诗教视野下的词史,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本位观下的词史,它与词真正的发展历程有着一定的距离。在《总目》的词史中,词作为抒情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审美性被过度消解,词史发展上许多新的思想突破和创新被作为批判对象加以否定,其价值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不仅未得到正确审视,反被视为消极因素予以肃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对词的独立性形成了干扰,也造成了《总目》词史发展脉络的失实和不完整,从根本上不利于词的多元化和健康发展。

三、以诗教评词作

《总目》的词学是由一个个词人和词集为架构建立起来的词籍体系和观念体系,其对词人、词集的定位和评价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即非常注重词人的人品气节,并以"有显有隐,有则有度"[⑤]的方式,形成了以著者人品为中心的"褒贬"批评模式,人的问题成为裁定、评价词的决定因素。这与朱彝尊《词综》甚至刻意规避政治词[⑥]的择选标准,形成极大的反差。"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⑦],于《总目》讲,这不单是一个文学评价标准问题,更是对传统诗教社会政教功用的认同和使用。《集部总叙》云:"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⑧]由此明确《总目》对整个集部取舍、定位和评价的基本思想和总体方针,再结合《词曲类》小序对词的轻鄙,可知本不足轻重的词之所以被"酌取往例,附之篇终"[⑨],主要是对世俗性文体的选择和规范可助清廷达到"以励臣节而正人心"[⑩]的政教目的。"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⑪],乾隆此话虽是于诗而言,实则从根本上明确了《总目》以"诗教"为宗旨的词学观与词学批评纲领。

作为官学,《总目》尤其注重"诗教"在词的品藻鉴裁中的重要作用。馆臣将一百多种词籍纳入官学的评价体系,其取舍、定位的主要标准即是诗教,体现在词类提要中就是"词以人重"的批评倾向。前者主要表现为在词人词集的甄选和定性、定位中,以符合传统诗教的人品即气节品格作为评价词人、断定词作等级的主要标准。后者主要以词类提要中"词以人重"的批评原则倾向来呈现。于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筠溪乐府》提要,第2788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芸窗词》提要,第2815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东堂词》提要,第2784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平斋词》提要,第2796页。

⑤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⑥诸葛忆兵:《千古词坛之圭臬——〈词综〉》,《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6期。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8"集部总叙",第1971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词曲类",第2779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52页。

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0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67页。

编纂体例而言，对不同词人词集作著录、存目、未收的区别，即反映其诗教标准衡量后的直接结果；对词人词作的批评来说，提要是表达馆臣诗教视野下词作批评的具体内容。从整体看，诗教是《总目》对词人词集进行等级划分和褒贬判断的直接标准和客观结果。《总目》在《凡例》[①]中将择选文集分为三类：一是论人而不论其书，二是论其书而不论其人，三是德行巨亏而文章华美者，作为批判之靶附于存目。这显然是一个以作者品行为划分标准的等级序列。尽管德行与文章同为其进行择录的主要维度，但在这个寄寓着褒贬的体系中，“德行”始终凌驾于“文章”之上。而其中对文的名分和人的名分的严格区分，更是体现了一种文学批评倾向，对“义”即著者气节品格的重视始终是第一准则。虽然在词籍编纂和提要的撰写过程中，具体情况会有所变化而不完全等同，但于总体思想和基本原则事实而言，则未出上述框条之外。

正与于敏中“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②]的等级分类相似，《总目》的词籍择选虽与其不尽同，但同样寄寓着诗教观念下的等级差别判断。就五十九种著录词集看，词人的“德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品行高尚，尤其符合传统诗教规范下的士人形象：不忘故国者，如吕滨老、张炎、蒋捷；气节高尚、忤逆权贵者，如葛胜仲、李弥逊、向子諲、杨无咎、黄公度、洪咨夔；一腔忠愤、感慨淋漓者，如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品行高洁、恬于仕进者，如赵长卿、黄升等。以上品德皆不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人品和词品相统一是入选的重要因素。有的甚至主要是词以人重的，如葛胜仲、葛立方父子，词集被著录，词作成就被比拟晏殊父子[③]，但并非学界公论，吴梅曰“门第誉望，可以齐驱。至论词，则虎贲之于中郎”[④]。《丹阳集》提要表明葛胜仲词被器重的根源在人[⑤]，馆臣赞其“气节甚伟”并认为“其宦绩亦足以自传。本不尽以文章重”[⑥]，体现了取舍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其实，馆臣的定位最初并没有上升到这种高度，与提要中将其与叶梦得相比的“品格亦复相埒”[⑦]不同，成书稍前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⑧]则曰：“胜仲多与叶梦得唱和，词格少亚于梦得，而工力大致相埒。”[⑨]这一微小的变动表明，馆臣出于整体考虑对该则提要做了调整。而将葛胜仲与著名词人叶梦得相提并论，无非是借以提高身价的“捆绑”操作。是以单就词而论，葛氏父子并不足以与辛弃疾等人一同进入《四库全书》著录词集之有“褒”无“贬”系列，关键是他们的气节品格抬升了词的地位，这里明显带有表彰其人品气节的意味，可见“词以人重”思想对词集评价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其思想之根本显然未出传统诗教范畴之外。

关于“拟抄者褒贬互见”之“贬”系列，《总目》也会出于诗教观念对个别词人的出格行为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进而淡化评价中“贬”的成分。忠君爱国的臣子节操最为馆臣看重，以至于某些词人禀性、作风以及词作上的不足，也会被向来严肃的馆臣宽容对待。如陈亮、刘过皆非循规蹈矩之士，前者“负气傲睨”[⑩]“不废北里之游”[⑪]，后者“跅弛更甚”[⑫]，不仅艳词“刻画猥亵，颇乖大雅”，且“代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凡例》，第33页。

②于敏中撰，张晓芝笺证：《四库全书馆密函：于敏中致陆锡熊手札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33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归愚词》提要，第2792页。

④吴梅：《词学通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8-89页。

⑤《宋史》卷445《文苑七·葛胜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26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6《丹阳集》提要，第2093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丹阳词》提要，第2787页。

⑧据林申清《〈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成书先后》（《黑龙江图书馆》，1990年第6期）一文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成书于《四库全书总目》之前。

⑨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词曲类”，第891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2《龙川文集》提要，第2157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龙川词》提要，第2793页。

⑫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2《龙洲集》提要，第2158页。

寿韩平原”[①],而馆臣对其人及词都给予了一定的包容。毛晋尝对陈亮词绮艳风格表示不解[②],而馆臣谓其“词体杂‘香奁’,不足为异”;刘过曾“身预南园之宴”,提要曰“纵横游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规言而矩行”。于馆臣而言,理解不等于赞成,而是更看重他们的品质:陈亮“才气雄毅,有志事功”,心胸“推倒一时豪杰”[③];刘过“叩阍上书”“颇得抗直声”“屡陈恢复大计”[④]。另有宋“宗室子”赵长卿,其词“瑕瑜互见”,或“纯用江右乡音”“剿袭”“纯作俳体”,但因“恬于仕进,觞咏自娱”的高洁性情,向来谨严的馆臣也“不以一眚废之”[⑤]。可见,诗教范畴下的气节品格足以成为“词以人重”的基本因素。

同为被著录词集的词人,《总目》也对人的名分和词的名分作严格区分,并以“春秋笔法”对人品气节问题进行揭示和贬斥,形成“拟抄者褒贬互见”之“贬”系列。如毛滂“附京以得官,徒擅才华”[⑥];王安中“为人反复炎凉”[⑦];曾覿“与龙大渊朋比为奸,名列《宋史·佞幸传》中,为谈艺者所不齿”[⑧];陆游“老而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⑨];吴文英“晚节颓唐”[⑩];史达祖“为侂胄党”“人不足道”[⑪]等。他们的词虽为《总目》著录,但对其品格问题的指摘却毫不含糊。尽管亦有“然才华富艳,亦不可掩”[⑫]“过而存之”[⑬]的圆融说辞,但从中不难感受到四库馆臣对人品的重视,其对人的名分和词的名分的严格区分,已然使被批判者因人格道德问题失去了人、词并重的机会,他们的词因为人格残缺而有了另类性质:即使褒其词,也不能不贬其人,词品和人品的不统一,词品也就因人品而位降一等,不能与人格完美者之词等量齐观。以陆游为例,《总目》对《放翁词》的整体评价不高。提要引刘克庄语“时掉书袋,要是一病”[⑭],讥其词用事未能入化。而馆臣所引只是冰山一角,原文乃“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⑮]。掉书袋仅是一癖,尚不到病,而“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之高全被漠视,可见“有主观选择性的考据”[⑯]向来是馆臣撰写提要时的常规操作手段。且同样之“病”,稼轩词品评未有涉及。更有杨慎从风格特点入手,谓陆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⑰]。馆臣未对此评正面回应,而是直指其短:“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对此评、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⑱]此段可谓诛心之论,以陆游之造诣,在馆臣笔下竟成了一个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龙洲词》提要,第2798页。

②毛晋:《宋六十名家词·龙川词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7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2《龙川文集》提要,第2157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2《龙洲集》提要,第2158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惜香乐府》提要,第2797-2798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东堂词》提要,第2784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初寮词》提要,第2785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海野词》提要,第2792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放翁词》提要,第2795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梦窗稿》提要,第2797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梅溪词》提要,第2800页。

⑫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初寮词》提要,第2785页。

⑬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海野词》提要,第2792页。

⑭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放翁词》提要,第2795页。

⑮刘克庄:《后村题跋》卷2《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丛书集成初编》(1569),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3页。

⑯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⑰杨慎著,岳淑珍导读:《词品》卷5《陆放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⑱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放翁词》提要,第2795页。

刻求浮名，却连诗、词之最基本的差异尚未区别之人。《放翁词》提要中并没有形成对陆词的系统评价，而是避实就虚，淡化了其地位和成就。在“褒贬”问题上，凸显“贬”方，“褒”面几无。从“拟抄者褒贬互见”之“褒”来说，如果被著录本身算是一种无声之“褒”，那么舍此以外《总目》中再无陆词的正面评价了。究其根源，实因陆游谀附韩侂胄[①]，虽晚年“自知其误”“终不能禁当代之传述”。可见因人品问题，陆游甚至算不得“有褒有贬”，而处于更低的“无褒有贬”系列。而馆臣不屑其人品，并以此生发的“迴戒”[②]后人之严肃态度，其背后所体现的诗教规范意义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对未入选词集词人之“贬”，也是《总目》以诗教评词作的重要表现。如朱敦儒、康与之的词集虽未被《总目》著录或存目，但批判仍在，主见于他人的著述提要中，构成了批评的第三个维度。朱敦儒是宋代著名隐逸词人，历来为词家喜爱，而《总目》未收其词，主要是鄙视其人，视其与陆游等为“晚节颓唐”的同一类型。而馆臣曾四次提及朱希真[③]，或变相肯定其诗歌造诣，或以朱之“惊赏”来抬高张孝祥词作水准[④]，或默认其作为词家三变[⑤]之一的词史贡献。康与之是南宋著名词人，馆臣极力揭露其为人的不堪，“及秦桧当国，乃附合求进…后遂专以歌词供奉，厕身优伶之班”，并毫不掩饰对其词的态度：“为谈艺者所轻，世不甚传，今亦未见其本。”[⑥]可见，由来已久的人品问题才是康词失传的根源所在。另张镃有《玉照堂词》收在《南湖集》中并被《总目》著录，而馆臣虽称其“工长短句”[⑦]，对其低劣人品的揭示也毫不留情。不重复收录虽是《总目》的基本原则，但张镃词未能入“词曲类”的结果中应不乏对作者人品的考量。

《总目》以诗教评论词作，还体现在对词籍择选的整体时代倾向上。明人因“惟务自便其私，而置国事于不问。故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己在事外，则嫉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⑧]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理念与传统诗教相违，而入选者甚少。仅著录的《花草粹编》《渚山堂词话》，是明人学术空疏、惟“嘲风弄月”[⑨]的反衬举证；《蕉窗荳隐词》《词林万选》《宋名家词》入存目是为了批判明人喜作伪本、版本低劣；施绍莘的“愁红惨绿之词”，被馆臣定为“亡国之音”[⑩]。《总目》从整体上全面否定明人与明词，诗教的维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党争、朋党现象一直是《总目》高度戒备的对象，主要是基于官学立场，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学术秩序的破坏力量，故对其批判随处可见，其根本还是出于诗教的规范意义。最典型的是对叶梦得词的定位和评价。叶梦得被定为“尊熙宁而抑元祐”的“绍圣余党”[⑪]，该观点首自方回[⑫]，余嘉锡已指其误[⑬]。而叶氏论苏、王之诗，纯从文艺角度，未“蓄意贬抑”[⑭]，“正不必牵涉到党争

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陆放翁》，《全宋笔记》（第6编9），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放翁词》提要，第2795页。

③按：分别为李处权《崧庵集》提要，汪莘《方壶存稿》提要，张孝祥《于湖词》提要，吴文英《梦窗稿》提要。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107、2166、2791、2797页。

④按：《点绛唇·流水泠泠》一首为朱翌作，非张孝祥词，而馆臣虽误，其用心仍在。有关该词作者的具体考证参见王培军：《四库提要笺注稿》，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⑤汪莘：《汪莘词话》，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8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3《昨梦录》提要，第1890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0《南湖集》提要，第2146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9《纪效新书》提要，第1302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花草粹编》提要，第2805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花影集》提要，第2816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6《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第2097页。

⑫方回：《瀛奎律髓》卷24《送严婿侍郎北使》，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3-1424页。

⑭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0页。

门户。”[①]而党争向来是《总目》逆鳞,加之馆臣对王安石新法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以梦得虽是“南北宋间之巨擘”,因政治立场问题而落入《总目》“论其书而不论其人”的著者评定等级。“主持王安石之学而阴抑苏、黄,颇乖正论,乃其为词,则又挹苏氏之余波。”馆臣对叶词百般挑剔,“倚声一道,去古诗颇远”“杂用陶潜之语”“近于苏轼”[②]。其实叶词对陶、苏的学习,在神理意味,而非格律声色[③]。其后期对苏轼词风的选择,也是基于家国剧变之后的情感表达需要[④]。馆臣基于既定的政治立场和诗教观念,误解了梦得其人及词,而《丹阳词》提要中又借其名抬高葛词成就的操作,恰是逻辑上不自洽的明证。

综上,诗教始终是《总目》定位词人、评价词作的重要标准,这是传统诗学人品与诗品、文品相统一观念在词学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也是《总目》对传统儒家诗教观的积极回应。其本质是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博弈,而实际上仍是“文化统治”[⑤]的问题。在《总目》的词作评价体系中,词并无多少独立性可言,其局限性以及对文学发展的不利是显而易见的。

四、补充与余论

中国固有的儒家诗教观念与架构、支配《四库全书》修纂的官学思想定格了《总目》中词与词学的地位,其中官学思想的因素更是决定性的,尽管如此,词学理论发展上的某些合理因素还是被馆臣吸纳,并逐渐发展为清代词学理论中的重要因子。在以诗教全面规约词学的前提下,《总目》亦严辨诗词之别,能够较深入地认识并维护词本身的艺术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强调学问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又能结合词体特点对词的语言做出具体规范。馆臣从文体兴变的角度认识到学力与创作间的关系,注重学问根柢在词体创作中的助益作用[⑥]。也能结合词的体量,认定词的语言要自然天拔,反对以学问为词[⑦],更反对生僻字、典重字的使用。其次,在思想表达和语言技巧上,反对过于精心雕琢的表达方式和过重所出的表达技巧,认为词风当以清新自然为主。虽肯定“才思新颖,不肯蹈袭故常”之作,但反对“失之琱琢”“过于求奇”[⑧]。在词句上,提倡寓以诗人句法,但强调语意、语句化用的自然浑成,鼓励自出新意,亦反对过重“所出”而“涉于胶固”[⑨]。再次,从词的音乐性出发,注重词的韵律美,主张词与韵协,强调词律和词意的协和,结合词韵本身特点,提倡以土音方言入词,但又表明不可纯用乡音[⑩],并指出不可以古韵入词[⑪]。

可见,馆臣在以诗教规约词体的同时,对词歌韵文学属性也有深入的认识,词体认知上比较圆融且走向深入。有学者指出,有清一代词论家们一直在“雅化”“诗化”的大前提下,“寻找着既能维护词的特质,而又使之与‘诗’的规范相结合的途径”[⑫]。相比于明代词学余绪云间派语言风格的“尚

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石林词》提要,第2787页。
③张仲谋:《宋词欣赏教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④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288页。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59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花间集》提要,第2803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词话》提要,第2808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炊闻词》提要,第2817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渚山堂词话》提要,第2808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惜香乐府》提要,第2798页。
⑪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哄堂词》,第2813页。
⑫蒋哲伦,傅蓉蓉:《中国诗学史》(词学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雅”[①]倾向，阳羡词派以词言志的“诗本位”[②]定位，浙西词派调和“诗本位”与固守“曲本位”两路词学矛盾却未找到有效方法的探索，《总目》的词学理论无疑是迈出了兼具方向性和实践性的一步。而词完成以传统的曲子化特色表现诗化内涵的复合体建构[③]的最终成果虽是在常州词派手中，但不能否认上承浙西、下启常州词派的《总目》以官学身份在这一艰难探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性作用。

而从词的创作实践看，在《总目》确立词的“官学”定位，使“词学”成为专门之学[④]，并将乾嘉考据学风引入，为中国词学“迄至晚清进入‘集大成’时期”[⑤]做出一定贡献的同时，也为词的发展戴上了枷锁。相较词人众多、流派纷呈的顺康两朝，乾嘉词坛“总体趋于沉寂”，词的风格也“从浙西、阳羡、饮水三家并峙到浙西一枝独秀”[⑥]。理论的选择和运用并不能摆脱时代的契机。如果说词体创作尚称繁荣的康熙朝，《历代诗余》的编订尚且为词体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精神支持，那么《总目》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词体创作做了收缩性的规范。以诗教规约词学，其实质是儒家传统诗教观念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词的束缚和遏制。《总目》承继《历代诗余》余绪，并以官方的最高权威推广，其影响是巨大的。而词体创作被限于“雅正”的圭臬，从文学的多样性来看，远非真正意义的繁荣。虽然《总目》对浙西派的门户壁垒有所开拓，但其对南宋辛弃疾一脉的推崇，更侧重词人忠君爱国的品行，这恰是对诗教的回应。由此可见，《总目》的多样论归根结底只是“封建制度和体系大框架范内的多样并存”[⑦]。词体创作的没落几乎是必然，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词在经历清代前期的一度‘中兴’后，其总的趋势是走向衰竭”，并指出“如果不受儒家诗教的‘雅正’观一再束缚，也许会出现某种新局面”[⑧]。我们不能否认《总目》在这一环词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人文项目规划工程”[⑨]，而作为其解题书目的《总目》则集中代表了国家意志的文学批评形态。在强调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的今天，对它们的研究依然可以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借鉴，这足以引起并值得我们重视。

[责任编辑：李　炜]

①陈子龙撰，孙启智校点：《安雅堂稿》卷5《幽兰草词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4页。

②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陈迦陵散体文集·词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③蒋哲伦，傅蓉蓉：《中国诗学史》（词学卷），第194页。

④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⑤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绪言第1页。

⑥朱惠国，刘明玉：《明清词研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42页。

⑦周积明：《纪昀评传》（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⑧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⑨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5页。